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

薄守生
赖慧玲 著

百年中国语言学思想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薄守生 赖慧玲 著

百年中国语言学思想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中国语言学思想史 / 薄守生, 赖慧玲著. —北京: 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1

ISBN 978-7-5161-7276-6

I. ①百… II. ①薄…②赖… III. ①语言学史-思想史-
中国 IV. ①H0-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01056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明
责任校对 王佳玉
责任印制 何艳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24.5
插页 2
字数 410 千字
定价 7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本成果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百年中国语言学思想史”〔项目批准号：12YJAZH001〕的结题成果。

◆ 本成果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国语言学史”〔项目批准号：12XYY001〕的阶段性成果。

序 一

序一，谨以此序献给鲁师爷。鲁老师确实是我的师爷，我还屡次辩称那不是“绍兴师爷”里的师爷。对于这样的称呼，鲁老师大概每次也都如大肚弥勒佛一样笑了。

本书完成后，我曾求当今中国最著名的语言学家之一鲁国尧老师赐序一篇。由于某些原因，鲁老师婉拒了。鲁老师说：“我建议你，不必要他人写序，我出了少量几本书，我从不请别人写序，而是写‘自序’。我的想法，古话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我认为最了解自己的人是自己，写作中的甘苦、得失，只有自己最清楚，他人并不真了解的，何必找他人呢。”鲁老师自己在书中都曾有过“第一序”、“第二序”呢，那不是他序，是自序，那不是两个不同版次的书序，是同一版次。既然如此，我也自己写下这个“序一”，也是自序。也许，鲁老师说的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中国语言学有“语言学思想”，中国语言学有“语言学思想史”。在中国语言学界，鲁老师首倡“中国语言学思想史”研究，并断言“中国语言学”绝非“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鲁老师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中国语言学思想史”这一重要议题，他深信：“语言学思想史”应当研究，值得研究。

长期以来，我常常通过邮寄纸质书信向鲁老师请教相关学术问题。虽然我们从未谋面，我亦未曾赠鲁老师什么青鸟鸿雁、束脩鲤鱼，鲁老师却为我买了几次邮票、多跑了几趟邮局，那大概也算是鲁老师外出散步锻炼了一下身体吧。只书信，无电话，没会面，只是这样的学缘！鲁老师有时说自己“近年脑力、视力就衰”，处理信件可能也会很慢，我跟鲁老师在进行学术交流时，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也许需要几个月时间才能交换一次意见。纸质书信在现代社会确实效率不高、够慢，但是，慢工出细活，书

信不会增加现代社会里的阵阵喧嚣，字字珠玑，暖暖情意。

中国语言学思想史研究，“坚实”为第一要义，充实、扎实、实学、实干，泛泛而谈“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纵论一番那肯定不够，“坚实”不会因“思想史”有“思想”而有所改变。“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中国语言学思想史研究亦如此。我对此题的研究，尚不足十年时间，作为作者，本书究竟文章会著几字空，我自己都不敢一个字一个字地去数。对于语言学而言，“文献”功底是“扎实”的重要方面之一，语言学思想史的基础是语言学文献。语言学文献浩如烟海，很难穷尽，多年前，鲁老师就曾经说过：“（有些）史料是穷尽不了的，因为冷不丁会从什么地方，或者什么收藏家那里冒出某个史料甚或一批史料。”^① 语言学思想史自古有之，不止“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孙中山之后还有语言学思想史。王力先生把清末到新中国成立前的时期称为语言学史上的“西学东渐”时期，鲁老师曾认为“20 世纪的后半叶基本上依然如旧”^②，仍旧基本上属于语言学的“西学东渐”时期。净是“西学”，何来“‘中国’语言学思想史”？然而，自近现代以来，特别是自中华民国成立之日始，中国语言学独立、语言学各部门逐渐形成，这些都是语言学史上的大事件。中国语言学的各个部门并非都是西学，其中不少内容都是“中国学”。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语言学思想史要多挖掘一些“中国因素”确实必要；相对于“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国语言学思想史侧重于研究“从孙中山到学孙子”更为必要。“民国语言学史”蕴藏着“中国语言学思想史”中重要的一部分内容。

鲁老师一直认为，当今的中国语言学研究，涵盖“中国语言学思想史”、“汉语通语史”、“汉语方言史”的“三史”研究较为薄弱，亟待加强。如果“三史”能够修成，中国语言学将跃进到一个更高的层次，那将是不同于“模仿”与“引进”的中国语言学。本书就是对“中国语言学思想史”研究的一次尝试，本书内容可能还不尽完善，但就钻研、探求精神而言我确实已经尽力了。至于本书的钻研是否成功，那还需要读者去检验，需要问题研究者们去评判。即使最后证明本书可能存在着种种

① 华学诚：《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鲁序第 7 页。

② 鲁国尧：《“振大汉之天声”——对近现代中国语言学发展大势的思考》，《语言科学》2006 年第 1 期。

的不足，我们在自主创新、原始创新方面还是尽力了，本书不是外国理论的“中国化”。即使本书可能存在着种种的不足，从此出发，“后出转精”的“中国语言学思想史”还是有希望能够修成。

薄守生

2015年5月15日

序 二

序二，谨以此序献给张导师。张老师是我的博士生导师，但他已经离开我读博士时的学校多年了，现在是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自从张老师到了南京以后，他忙我也忙，我们平时的联系也已经很少了。一年年累积下来，张老师带的博士也越来越多了，如果这样下去，他要想顾得上哪一个学生可能也难了。

本书完成后，我曾求在我国屈指可数的最著名的元明音韵学专家张玉来老师赐序一篇。名牌大学五六月份的博导，实在是太忙了！张老师只给了我几个字的时间：“好书不在序”。张老师对我很真诚，就纯学术谈纯学术，他跟我说：“对于我不熟的研究领域，我不敢写序。”张老师原来主要致力于明代音韵学研究，近年来追溯到元代音韵学研究，术业专攻，越来越专了。如果张老师对“语言学思想史”自认为有所研究，他会热情洋溢地给我这本书写一大篇长序。年轻时代，张老师年轻气盛、豪情万丈，好儿男浑身是胆。如今，原来的那个张老师哪里去了？学术真是磨碎人！就这样，原本属于张老师写的这篇序言还是由我自己来写吧，这篇序言亦不可或缺。

语言学史难，高不成，低就也难。如果细致下去，写史就举步维艰。张老师曾说：“在完成《韵略汇通音系研究》之后，曾有写一本明代音史的雄心，可写来写去，总不能满意……一部《汇通》花了七年，这部《易通》差不多也花了七年。算算时间，这一生也许只能做这样几件‘低就’的事，《明代音史》可能仅是追求的一个目标。”^①但是，一个人的思维不能仅仅那样看待，张老师一部《明代音史》至今未成，然而，数家《中国语言学史》通史教材早就出版多年了。如果大家都采用张老师

① 张玉来：《韵略易通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自序。

这种“低就”的办法，任何一种形式的语言学史研究大概都无法进行下去了。其实，对于语言学史（语言学思想史）研究而言，高低错落、疏密有度，就是高成。

中国向来是一个土著的国度。长期以来，中国的传统语言文字学一直沿袭着自身固有的学术道统，即便维新亦很守旧，这也许是中华文明数千年来得以延续、无间断的奥秘所在。我们为拥有这样的文明而自豪，然而，我们很少去反思什么。中国人闭关修炼了几千年，至今却还没有炼出仙丹或者修成神仙。

汉唐佛教可能属于“拿来主义”，反切、等韵大概属于邯郸学步一类的实用主义，但到了现在却仍有着无数难解的谜。明末及清耶稣会士可能属于“送来主义”，由此导源出了各式拼音字母、各种拼音方案，然而，汉字却不甘心成为“语音中心主义”的奴隶；反抗，最后妥协成了《简化汉字方案》。自从民国时期，我们虽然有过“送去主义”，语言文字之学终于可以依附于几件古董之中留洋出国，但是，中国语言学的国际影响至今都几乎为零。华人王士元的“词汇扩散理论”也许可以作为唯一的例外，但它照样还是“舶来品”。国人们的“送去”亦颇不成功。

近代中国多灾多难，“洋枪洋炮”却最终还是让位于“大刀长矛”。曾经何时，马建忠《马氏文通》和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一中一洋或是一洋一中，总算使中国语言学有了一次获得新生的机会。中国语言学独立、语言学各部门逐渐形成，语言学始才一日千里。然而，保守势力、旧派人士却屡屡暗下绊马索，先进人士们往往最终也只能落得个“且行且珍惜”。在此情形之下，中国语言学要想获得发展，可能必须做到如下数端：坚持学术开放、鼓励学术多元化、本体与理论并重、融合古今中外^①。然而，中国始终不是一个真正的移民国家，比例甚低的“国内移民”也常常要“落叶归根”。在这样的国度里，守着一个山头、躲在一棵树后，就可以坐等人仰马翻。“道路问题”大矣哉，路漫漫其修远兮！

中国语言学有“语言学思想”，亦有“语言学思想史”。“道路问题”就是语言学思想史，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课题。作为二级学科，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虽然不像汉语言文字学那么传统，但是，总体上来说，它

^① 张玉来：《近代学术转型与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建立》，《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们基本上都算是传统学科、基础学科，这样的学科要想创新通常非常困难。像这样的基础学科，重复题目不少，好题目可能不容易找，所以，一位学者能够提出几个有价值的研究题目那往往需要具有极大的智慧，如果能够提出几个好题目那一定是最优秀的学者。然而，仅仅提出几个好题目也许还不够，身先士卒地去研究其中的某个题目可能更重要、更务实一些。对每一位学者而言，做题目可能比出题目更值得称扬。如果有了一个好题目，伟大的学者们一般都不会依赖于那些前来“揭皇榜”的人，他们自己就可以一点一滴地从头做起，那样才是负责任的学者。负责任就是一种爱，大爱当无边！

“语言学思想史”应该“问题”很大，我确实为此捏把汗，中国向来不喜欢“无根游谈”。但是，任何研究都是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总得有“迈开步”向前走的时候，试水始能远涉，本书就算作是过河的半截桥墩吧。或者大水冲垮了桥墩，或者愚公建桥天堑通途。“大”东西很多，地球就不小，“地球科学”却可以很实在。银河系以外更“大”得远着呢，如果想要研究得太微观，那只能使人发疯。至于其他的，细胞、基因、核苷酸、分子、原子和黑洞，东西虽小，却都是一些“大”问题。语言以及语言学，它们本身究竟是大过“河外星系”呢，还是关于它们的“问题”会大过核苷酸、黑洞？我不知道。即使如此，我觉得“语言学思想史”还是很值得研究。

薄守生

2015年5月18日

目 录

前言：不敢言勇	(1)
第一章 中国语言学思想史研究初阶	(6)
第二章 关键词写法的中国语言学思想史之开篇	(13)
第三章 中国语法学思想史之开篇	(18)
第四章 语言学文献、语言学史、语言学思想史	(26)
第一节 百年来的语言学文献	(27)
第二节 语言学史论著举隅	(43)
第三节 中国语言学思想史	(71)
第五章 民国语言学史之《集刊》研究	(77)
第六章 语言学各分支学科形成的理论思考	(88)
第一节 传统语言文字学的继续发展	(90)
第二节 语言学新兴学科的形成	(104)
第七章 阶级定性、民主与科学	(153)
第一节 语言学与阶级论	(153)
第二节 拉丁化：党的语言政治的实现路径	(159)
第三节 科学与民主：语言学的前世今生	(170)
第八章 传统还是现代人文	(179)
第一节 语言学：社会背景与时代精神	(181)
第二节 语言（学）的人文性问题	(188)
第三节 从基础教育触及语言学问题	(195)

第九章 艺术与语言	(201)
第十章 文学与语言	(211)
第一节 语言的文学与文学的语言	(212)
第二节 语言学史视域中的 30 年代大众语运动	(214)
第三节 “文学”的定型与“‘文学’学”的生造	(233)
第四节 书面文学对语言学研究的制约	(239)
第十一章 文化语言学的海市蜃楼	(242)
第一节 文化语言学的简单回顾与评论	(244)
第二节 文化语言学不同于社会语言学	(248)
第十二章 哲学与语言学流派的关系	(252)
第一节 哲学对语言学发展的影响	(254)
第二节 语言学对哲学发展的影响	(257)
第十三章 普通语言学包含于理论语言学	(262)
第一节 普通语言学与理论语言学	(263)
第二节 普通语言学与语言学史	(269)
第三节 民国时期的语言学概论类教材史略	(278)
第十四章 语言学思想史不等同于理论语言学史	(289)
第一节 方法论、方法与语言学理论	(291)
第二节 外国语言学对中国语言学的影响	(306)
第三节 中国语言学的国际化的问题	(324)
第十五章 一部相对系统的语言学思想史	(328)
参考文献	(344)
后记：多余的话	(375)

前言：不敢言勇

有时候，做学问确实存在着无知者无畏的情形。虽然选了语言学思想史这个题目，在此，我们却不敢言勇。

语言学大家鲁国尧曾大声呼吁：“我热切企盼第一本《中国语言学思想史》的诞生！”^① 我们也曾热切地想读到一本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语言学思想史》专著，却一直未能如愿。作为一个重要的语言学议题，让“语言学思想史”一直都“空白”似乎并不合适。我们曾认为，整个21世纪的100年里出现三五本类似专著并不夸张，只要它们不是“相互剽窃”就行。我们在这里拿出来的这部书，自己感觉写得还不够成熟，我们也一直在顾虑要不要拿出来给大家看。但是，我们相信所谓的成熟大多数都从不成熟中来，语言学思想史研究在我们的这部书之后也许还要经历那么一两本书才能逐渐成熟起来。对于那一些填补空白的著述，我们不能苛求太多，能够做到“开卷有益”就足矣了。《中国语言学思想史》是当前的学术空白，但这并不代表着我们愿意去抢占“空白”。我们相信，任何“真正的空白”都不可能是由某一个人一下子就完全“填补”完了，那需要一个时代的一群人来填补才行，这正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问”之深意——不然的话，我们今天的“学术空白”早就被秦始皇所填补完了！

“填补空白”！这一向是让我们害怕的事情，我们可不敢言勇。其实，面对“语言学思想史”这么一个课题，很多大家都明白要完成这么一项任务实属“出力不讨好”。为什么有可能会“出力不讨好”呢？我们在学术史研究中，我们所“鼓吹”的理念未必会为被鼓吹者领情，他们至少可以表现出某种清高；我们所批评的某些理念却又会引起被批评者的憎

^① 鲁国尧：《语言学文集：考证、义理、辞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3页。

恨，他们却很少会站出来把问题摆到台面上来回应。语言学思想史研究能否完全地不透露出著者的倾向来？似乎不行，语言学史研究要求“史论结合”，没有“论”就不足以称语言学史，“论”就是观点、就是倾向。当然，我们在进行史论的过程中，尽可能地按照“线”来书写，很少会揪住某个学者的某一个“点”不放。再说了，语言学家为数众多，任何一部语言学史必然都会有“挂一漏万”的时候，而实际上“漏”了谁都不好。面对这样的语言学思想史，读者会信耶？疑耶？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有两点远远比信与疑更让我们感到无助，关于信与疑的困惑让位于对这两点的正视亦无妨。其一，以往的大多数语言学史著述几乎都是重视论据、淡化论点，往往显得非常零散、甚至支离破碎、不够流畅、总是很卡、让人不能卒读，在这种情况下，书写上的“流畅性”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其二，自从现代语言学脱离了传统语言学，语言研究中对“语言形式”的重视远远超出了对单纯的“意义阐释”的重视，与“意义”相隔离就是与思想相分离，中国语言学有沦为“行尸走肉”的空窍僵尸的危险。语言学思想史研究就是旨在“彰显”中国语言学的“灵魂”。百年来，中国语言学决不是“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①。然而，“灵魂”能够很轻松地书写吗？

我们都不曾行尸走肉，我们也可以不辞艰辛、二万五千里长征。然而，我们走路是像阿甘一样只是凭直觉在不停地跑？还是像长征初期一样逃跑只是为了活命？这却又实实在在地让我们当今时代的每一位语言研究者都感到困惑。难不成只有蒋介石聪明，只有他才懂得挑选发达、富庶的地区作为自己的根据地？在不具备外部条件的时候，农村果真能够包围城市？我们知道，很多语言学大家其实也曾内心苦闷，“找不到北”的时候并不在少数，对于研究上的“根据地”也并不是就完全的没有动摇过，只是很多人都在坚守着。至于那些语言学小家们，就更不可能有自己的“根据地”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只要没有过多的苛捐杂税，只要风调雨顺，有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可以坚守就是一种幸福。当然，根据国际法理，人们在面对“无主地”的时候就可以“先入为主”，“后人”就是侵略战争、农民起义。依此相律，“对外汉语教学”就曾是中国语言学的“无主地”，笔者的一个老师曾数次提到过张旺熹先生（现在已

^① 鲁国尧：《语言学文集：考证、义理、辞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7页。

经成为“对外汉语教学”领域里的“大家”之一了),说他们差不多都是同期学者、曾同样在坚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张旺熹“转向”早、成功也早,这大有“要转向要趁早”的感慨。他们那些同期学者,现在都是语言学大家了,他们的苦闷,他们的坚守,他们的成功,所有的这一切都解答不了我们当今时代年轻、后辈学者们的困惑。“要不要坚守”?这是时刻叩问人们内心的一个问题。就以笔者个人而言,我的根据地在哪里?我并不知道,甚至无法知情。最近几年,笔者在做百年语言学思想史、民国语言学史,这样的题目注定要去多多地“远眺”人家的“一亩三分地”才行,并且,笔者自己不可能占有语言学任何一个分支学科的“一亩三分地”^①。笔者也想要有自己的“专业性”,然而,仅仅“远眺”却不会被人们认为是一个专业。笔者也不希望人们认定做语言学思想史的人都不专业,我想,我绝对不能因为我自己这么一头“耕牛”就害了“语言学思想史”这“三亩良田”!我想,我未来还是要走“专业化”的路,既要“远眺”又要“埋头”。语言学史在现有的语言学学科分支目录上虽然还没有“土地证”,只要我还在辛勤地耕耘着,这就是我的土地,土地虽小,其他的任何人都不能捏着一张从未存在过的“土地证”来驱赶我,这就是我的专业。

即使在语言本体研究上许多学者已经“找不到北”了,但他们仍然在坚守,这很值得我们尊重。毋庸置疑,语言本体研究是语言学的核心工作、硬骨头,其他一切的所谓研究都是语言学的边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都能达成共识、不会争议。但是,当学者们一味强调本体研究,却又在本体研究上无法突破、原地彷徨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换种思路、换个想法呢?非常遗憾的是,有些学者在中心工作上无法进行下去了,还对其他人的边缘研究说三道四,不予重视。如果他们能够突破,对于边缘研究说三道四我们都可以理解;然而,在他们也同样是无法前行了的时候,我们大家还是都一起换个思路想问题比较好。并且,我们深知,即使边缘研究取得了很大的突破,我们依然非常低调,我们即使成功了我们也坦然自己做的工作不是语言学研究的中心工作。只有到了大家都心平气和、客观

^① 在当前的《学科分类与代码》中,我们可以看到“地球科学史”、“数学史”、“物理学史”等等,我们却找不到“语言学史”。根据学理相近原则,学界常常把“语言学史”放在“普通语言学”下面;如果实在没有办法,恐怕只能放在“语言学及其他学科”下面,从而勉强找到一个位置。现有的中国语言学的各个分支学科中,并没有语言学史的“一亩三分地”存在。

公正地看待问题的时候,那时的语言学也许会有个大的发展了。在中国,语言学史研究不是语言学的研究中心;在欧美国家,语言学史研究却是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分支。

语言学史包含语言学思想史。人们究竟是如何认识“学术思想”的呢?对此,笔者认为这也值得简单说明一下。学术研究离不开思想,保守的“文献派”们或许并不太重视思想本身。但是,如果“只”“要”“思想”,那么,哪一个人会没有“思想”呢?随便“瞎想想”的话,谁不会呢?这或许正是鲁国尧《语言学文集:考证、义理、辞章》中的“考证、义理”之意^①,思想也需要考据。只是,鲁国尧的这个表述与桐城派的“义理、考据、辞章”太过相近,很容易被人误认为是一种“低水平重复”,这确实是这个书名之大不幸。

语言学界究竟由谁来做语言学思想史研究这项工作合适呢?这样艰难险阻的工作,也许只有有资历的老牌学者才有能力去做。但是,那些老资格的学者可能都不愿意去做,一是难,他们要做就得做好,他们并不愿意因为做出了一个不像样的东西而晚节不保、落下口实。一是脱俗了,不愿凑热闹,那些资历老的学者有些脱俗脱得很彻底。比如说,在中国修辞学会乱哄哄的那阵子,有修辞学方面的老专家自己说他宁愿天天遛狗也不愿去谈什么修辞学……学术就是学术,来不得半点虚假,如果哪一种学术有水分那还是主动把水分亮出来为好,免得他人上当受骗、浪费时间。学术只是学术,纯粹的学术可以相对单纯一些。学术要忠实、纯粹,只要保住了这样的学术底线,即使是资历尚浅的年轻学者也是可以去从事像语言学思想史这样的研究。

书写语言学史、语言学思想史,通常需要我们拥有一种豁达的情怀。何九盈在《中国现代语言学史》的“后记”中说:“有时候,我也到小清河去,独立桥头,遥望西山苍茫,俯视逝者如斯,此心若洗,百障皆空……”^②这种境界实在是高妙,可惜的是,何老先生大概无意于再写出一部《中国语言学思想史》了。最近几年来,对于做学问,我也曾希望自己能够拥有一种豁达的情怀。如果没有一种豁达的情怀,或者偶尔会焦躁不安,那时候我们就需要反思自己。“任何学问都必须以平和、踏实的

① 鲁国尧:《语言学文集:考证、义理、辞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② 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809页。

心态才能真正地做好……平和、踏实的心态更是幸福的唯一保证”^①，这就是“豁达情怀”的最基本的要求。然而，事情并不会总是只有一个方面，“豁达”之外，学术研究同样需要“苦闷”。“苦闷”就是“独立思考”，没有独立思考的学术肯定不是好学术，学术不能像交际花一样闹闹哄哄，学术通常都需要冷板凳精神。所以，我们既需要适当苦闷，又需要绝对豁达。当然，豁达也不是每个人想豁达就能够豁达的事情，任何人在现实生活中都有可能会遇到诸如“赶工期”或者“填量表”之类的“俗务”，这时我们只能把自己的本真藏于内心之中。就这样，即使我们总是来去匆匆，我们也在尽量把握住自己内心深处那些些许片刻的宁静，你我他谁也不例外。唯其如此，百障皆空……

书写一部中国语言学思想史专著必定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对此我们已经想清楚了，我们不敢言勇。既然已经想清楚了，我们还是写出来了一部中国语言学思想史，我们不勇也勇了，只是我们更渴望豁达。

^① 薄守生：《〈汉语言学初探〉书后》，《现代语文》2010年第2期。